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丛书

温铁军 编委会主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潘维 贺雪峰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丛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潘维 贺雪峰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潘维,贺雪峰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6
ISBN 7-5017-7419-6

I. 社… II. ①潘…②贺… III. 农村—社会主义
建设—研究—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607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乔卫兵(电话:010-68300010, E-mail:weibingq@sina.com)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 本:A5

印张:12.875 字数:305千字

版 次:2006年6月第1版

印次: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书 号:ISBN 7-5017-7419-6/F·5975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序：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潘 维

一、此书的由来

在传统社会里,我国实行的家庭耕作延续了两千四百年。从1956到1981年,我国农民的集体耕作持续了25年。从1981到2006年,我国农民退回家庭耕作也已持续了25年。在这50年中,我国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迅速变迁,综合实力飞速壮大,为城市援助农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决定:自2006年元月1日起,取消已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农业税。在此之前,政府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两项收费,还明令禁止以“乱收费”知名的农村社区事业“摊派”。2005年冬,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准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2006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并进行了具体的财政规划部署。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为标志,我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我国各界相当一致地拥护这一战略决策。但同时,大家对农村困境的由来、解决办法、发展前景存在诸多不同看法。农村贫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学界和政界的解答五花八门,比如,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村缺少“基础设施”,国家投入不足,基层官员太多而且腐败,国家政权的“下沉”,农民“权利”被剥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城市的剥削等。国家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资金应当投向哪里?计有社区环境、扶危救困、水电通讯、硬化乡村道路等多种说法。有人认



为,这笔钱会变成浪费、贪污、或者“形象工程”的新动力。换言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怎样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于2006年2月18~1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以期促进关于农村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本文集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在此,笔者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谈点浅见,权作本书的《序言》。

二、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见到的事

2005年暑假,笔者率北大一些学生去华北西端某国家级贫困县做社会调查。下面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三个故事,对新农村建设非常有启示性。

1. 三十户农家买不起的变压器。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平地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向县委副书记汇报了下面的困境:在庄稼灌浆期最需要水的时候,某村民小组三十户人提取地下水的变压器坏了,水浇地没法抽水灌溉。靠汲取地下水灌溉的地是水浇地,比旱地的产出几乎高一倍。地下水不要钱,可提井水要付电费。变压器由一家农户承包管理。这家农户代收电费,并用电费支付管理维修费。承包户愿意支付变压器维修费,县供电局却不肯维修。供电局称:依国家技术规定,这台变压器早已超期服役,不能再修,必须报废。然而,新变压器要六千元,承包户不肯出这笔钱。承包合同规定,承包户负维修责任,没有折旧更新的责任。农时不待人,这三十个农户因变压器而面临生计危险。

为什么这三十户不能每户出二百元,集资购买新的变压器呢?村支书严肃回答地说,三十户共同所有,就成“集体资产”了,没人干这种傻事。那让承包户购买呢?村长的回答是,承包户买

不起。即使买得起，村民也不肯支付比现在更高的电价，因为种粮不赚钱，只供自己的口粮。所以，谁买变压器谁吃亏。而旧变压器是“原先的集体资产”。据村长说，村民们认为：“国家”收电费，应当由“国家”来付新变压器的钱。

然而，谁是“国家”呢？乡里已经没有“财政”了，管理两万多人的乡政府每年只有两万元办公费，自己连台办公电脑都买不起，遑论给每30户买新变压器。县政府状况也差不多，县府每年的收入仅及开支的10%，其余90%的开支靠中央政府每年一亿多元的“转移支付”。换句话说，“国家”已经“承包”了整个县的党政文教。再“承包”每30户农民一台变压器，还不如“承包”他们的口粮。如果管理世界1/5人口的我国中央政府，强大到能为每30户人家提供一个变压器，这个政府就成恐龙了。事实上，全县农民每年的口粮也就值一亿元的1/3。我问到：若“国家”认为没责任负担这台变压器怎么办？村长回答说，要是这30户打不上粮食，“国家”就得负担他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喜剧。县委副书记当即用手机给供电局长打电话，命他立即派人来村维修这台变压器。供电局长只能服从。我问副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是，“我是这个村的人，村书记和我是最要好的小学同学，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再问，那实在维修不了怎么办，其他村民怎么办，其他村怎么办？全县农村大多数变压器都进入了报废期，又怎么办？他笑着说，“没办法，等着‘国家转移支付’吧。”我从这个故事中领悟到，仅靠“国家”的社会主义，却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去对接，那就只有旧农村，不会有“新农村”。

2.“转移支付”修的“渠”。一个山区贫困村的支书向县委副书记提出一个“宏伟规划”。村里全是旱地，但山里有股泉水。要能把泉水引到村里，全村旱地都“可能”变成水浇地。他希望县里帮他申请30万元“国家转移支付”，引水进村。县委副书记答应了。



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上，哪来的能持续多年浇灌上千亩山坡地的“泉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若是早年间就有，恐怕“人民公社”那会儿就修了。若是新来的泉水，等修好了渠，泉水可能又突然消失了。无独有偶，这个县刚申请到了五亿元“国家专项转移支付”，是在县境内某条“河”上修个水坝。但那“河”实际上是条山里泄洪的通道，已经干涸很多年。虽然如此，因为该县是某部委承包的“扶贫”基地，该部还是帮助这黄土山上的“国家扶贫水利工程”立了项。

即使村支书说的“泉”是真的，修渠到底要花多少钱？就目前的情况，“转移支付”的1/3能落实到村就已经很好了。由此，为那30万工程款，他大概得申请100万元。然而，100万元与该村可能增产的粮食相比，还不如国家白送农民这些粮食。况且，这个村正在变成“空心村”，半数青壮年都离开了。我问老支书，如果给你十万元，多余的钱归你，你能组织村里人把水渠修起来吗？他回答，可能。又问，如果退回25年以上，在人民公社时期，修这个引水渠要多少钱？他回答说，“不需要什么钱就能修，冬天没事干就修渠。”

通往这个小山村的山路没有“硬化”。我猜想，坐汽车来的客人们还会想到让国家来硬化这条道路。但村里没有机动车，只有驴和骡马，当然还有人力。

如果国家成了慈善家，甚至“散财童子”，我们不会得到“新农村”。

3. 高效的“转移支付”。我们访问了县城里的三所中学，都是近两年重建的，也都是全县最壮观、最大型的建筑。正是在这三所中学，我们看到了农村人仅存的体育和文艺活动，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现代合作精神。

县一中是高中，而且是地级市的重点中学，升学率高达80%，许多大城里的孩子付费来这里念高中。这所学校教学、体育、卫

生、用餐设施完备,学生宿舍八人一间房。教员是本地区收入最高的“公家人”,工资与学生升学情况挂钩。

县二中是初中,最有趣。县里挪用财政,仅用了400万元就重建了这所壮观、漂亮的中学,还有个400米跑道的大运动场。一个私人企业家投资并管理学校的主餐厅,可供五六百人井然有序地同时就餐。两栋漂亮的大宿舍楼每间住十个学生,每层配两个大卫生间。与一中一样,每个班学生有80人左右。在舍监督促下,学生定时起床、洗漱、晨练、就餐、上课、上晚自习、再洗漱熄灯就寝。宿舍干净整齐。这所上千学生的公立学校不靠国家拨款,完成基建之后就自我运营了。学校每年支出三四百万元,其中部分由大城里来的借读生用学费支付,部分靠国家给教师的人头费和收取学生的宿舍费和杂费。

县三中与县二中情况相同,只是学校有个不是市“重点”的高中。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一所“职业高中”,也就是过去说的“技校”。

这个县有一半的农家孩子读不起中学,或者不能完成初中教育。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山村,老支书自豪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努力,在县里的帮助下,村里几年前重修了小学。我们去看了这所村“小学”。学校总共两个教员,教全村五个年级共二十多个孩子。学校极为简陋,却是村里两栋砖瓦房之一。村里不住窑洞的仅一户人家,户主30多岁,是个返乡的高中毕业生。学校是一排30多米长的简易平房,包括两间教室,两间教师宿舍,一个办公室。教室的黑板是用水泥抹的,刷上了黑漆,但漆已剥落了。户外有个席子围合起来的露天厕所,里面“养着”密密麻麻的蛆和扑头盖脸的苍蝇,当然还有令人立即想呕吐的气味。在那厕所旁边,“校长”为我们十几个师生和官员烧了午饭。

那个五亿元的水坝,那笔国家每年支出上亿元的“转移支



付”，还有那小山村计划申请的 30 万或者 100 万元水渠项目，能够建造多少所 400 万元一个的初级中学或职业高中？如果主食、宿舍、校服、书本免费，农民们会送自己孩子到县城读中学的。“国家转移支付”加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救助，可以轻易做到这些。减少农耕人口，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正是“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人力资本是我国拥有的最大资本。如果孩子们读完了中学，习惯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书报的生活，习惯了干净的被褥和卫生设施，习惯了洗漱，习惯了文艺和体育活动，他们会不愿回到那肮脏黑暗的窑洞里去，不再能容忍肮脏的饮水和“厕所”，不再能容忍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管将来毕业做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留在城里工作，不再是自生自灭的个体农民。与此同时，乡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成倍扩大，他们留在乡下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就能改善生活。一个劳动力耕作五亩地与耕作三十亩地，收入有质的不同，而且不用在黄土秃岭上去修水渠、水坝。即便因劳力短缺而退耕还林，甚至弃耕那黄土秃山，也比增产那一点粮食合算。一家一户种自家口粮，那是一种古老中国的“小康”，而今意味着贫困。要古老的“乡村中国”，还是少年的“城市中国”？答案存在于孩子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初中和职业高中成为最大的“扶贫”投资项目。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们还可以让四十岁以下的农民自愿接受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我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我们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制定恰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才能处理好国家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

从根本上讲,我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1. 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发达国家,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 10% 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 5000 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 5000 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亿元)。我国 GDP 近 19 万亿元,粮食只占我国财富总量的 5%。大陆与台湾 2005 年的贸易额是 7300 亿元。2006 年 4 月,吴仪副总理访美,一次团购即达 1300 亿元。

2. 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多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我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自 1840 年起,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其中包括将近五亿农村劳动力。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固定。因此,农业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3. 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出工不出力,以“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我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



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化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和畜牧时代,西方的劳动者为“主人”工作,民间积累的财富不如为自己工作的中国农民。但在工业时代,有组织的西方社会迅速超越了中国。

4. 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即农村与城市急剧扩大的鸿沟。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 21 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5. 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我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概括起来,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1)制造的产品取代种养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2)我国农民太多,因此人

均耕地面积太少,农业不成为产业,甚至倒退回自然经济;(3)我国农民自由独立,不善合作,难以组织起来闯入非农领域,甚至无力组织起社区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社区生活环境;(4)不合作的家庭小农正在被国内和国际的规模农业市场无情地淘汰和摧毁。(5)破败的农村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更难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劳动。

在上述条件下,我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求救信号,也向城市发出了警号。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我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认识,建设“新农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我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

四、三大关系与新农村的长期规划

了解了农村事务的规律,新农村建设就要尊重和利用规律,进行战略筹划,集中财力去处理三大关系。一是国家投入与村民自助的关系;二是村民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的关系;三是乡村眼下的具体需求与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

1. 国家投入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税费负担没有了,农民与政



府的矛盾减少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我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

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但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300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3000亿元,其中的两千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1000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

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三百万个自然村或五十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富裕强大如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乡村简易公路很容易损坏,养护费用高于建设费用。只建不养,几年后那条路就会成为人民政治笑话的对象。

第二,“自然经济”无力支撑“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产生的,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

当今农村正处在劳力向外流动的大潮之中,出现了许多“空

心化”村庄。硬化了路面,却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运输工具,当然不经济。办小学,二十几个学生一所学校,很不经济。办有线通讯和电视,也不经济。强行投入不经济的事,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财力。“国家”本身并没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包办所有的农村社区经济,就要获取农村社区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经济的全部收入。

“新农村”的建设者不是“国家”,只能是我国农村人民,是农民的“自助”。国家不是散财童子,而是“新农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要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民的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人均一两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三四个月的简单劳动,八个月失业在家赌博,当然贫穷。我国向有“救急不救穷”之说。每月人均十块钱的慈善扭转不了农村的衰败、贫穷。

农民只有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劳动,才可能“自助”,才能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才能修缮社区的水利、道路、桥梁、电力、文化设施,才能普及科学和卫生知识,才能维护本地社会秩序和改善社会风气。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合作精神,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就不可能体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但农民自己却无力组织起来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政府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全部起点。

谁来组织农民社区自助?当然要依靠植根于乡村的我国基层党政组织。我国的农民不是没有组织的农民,党和政府已经渗入到了乡村的基层社区,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渗入”使农民不堪其负。事实是,“渗入”是人民公社时期乃至人民公社以前就发生了的,“不堪其负”却是回归家庭耕作之后才发生的,是党

政基层组织涣散乃至瘫痪之后发生的,是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发生的。

要使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我组织起来”,是空想。若中国农民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会有 1900 年仅仅两万个八国联军士兵就从 4 亿 5000 万中国农民手中抢走 4 亿 5000 万两白银的事,不会有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占领半个中国的事。一句话,如果小农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现代化,我国根本就不会出现共产党。

靠大学教授或者一小批有激情的大学生去组织农民,也是空想。民国时,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都带着学生搞过“乡建”。虽其唐·吉诃德式的精神令人感佩,他们能做到的,较之党和政府,乃是九牛一毛。农大的何慧丽老师之所以能在河南兰考县组织起农民合作社和农民文体活动,不是因为她是农大老师,而因为她挂职任该县副县长。组织农民,靠的不是比农民更丰富的书本知识,而是靠实际操作能力,靠生于兹,长于兹,熟悉当地民风民情的基层党政干部。

尽管我们的答案是依靠基层政权,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高级官员,却对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政权高度不信任,经常把他们看成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然而,不靠基层党和政府又能靠谁呢?总不能靠宗法组织、黑社会、反政府组织、甚至外国宗教势力来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吧!固然,基层党政机构存在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然而,那是改善基层政权的理由,不是所谓“国退民进”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理由,不是取消基层政权的理由,更不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正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府和基层政权,自回归家庭耕作到 90 年代中期的 15 年里,我国农村没有出现基层的权力真空,以自由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农村经受住了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农村社会基本保持了稳定,甚至还取得了三大成就。第一,在极为困难的财政条件下,基层政权组织起数亿农民家庭去维持九年

义务教育体系。我国新一代农村人继续成为能写会算的劳动者，积累了我国的“人力资本”。第二，在极为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基层政权自发组织了农村工业建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90年代前半期构成我国工业、出口和税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好局面，并使我国农村人熟悉了非农产业的工作。第三，在极为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基层政权维持了乡村社会秩序。他们在维护水利设施，环境、森林、水土、卫生、公共设施、征兵复员等方面尽了力，他们为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国家的税收政策，为落实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尽了力。没有他们在困境中的努力，我国政权就是空中楼阁，政府就没了腿和脚。

然而，正是这些基层干部们，十年来被舆论大肆妖魔化。成功是“专制”，不成功是“无能”，而贿选出来却被说成“有合法性”。这也是我国农村走向破败和混乱的十年。

当基层政权被剥夺了财权，被舆论抹黑，并且自上而下地堕落，社会主义的社区自治组织就瓦解了，农村人民又成了一盘散沙，回到了自然经济时代。各种农村社区事业，包括水利、教育、医疗、卫生、社团都在衰败甚至垮掉了。在农业方面的衰落更明显。机耕被废除了，因为机器翻不过密密麻麻的田埂，也没有谁家愿意贡献机耕路占用的田地。牛耕被放弃了，因为一户仅两三亩地，养牛耕地不合算。于是个体农户则退到了靠人力耕地。再有，双季稻产区只种一季稻，因为人力成本高，自己吃一季就够了，种双季不合算。这不是“新农村”，而是旧农村。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在1840年敲响了传统农耕社会的丧钟，形成了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有了共产党的胜利及合作精神的推广。在今天繁荣的城市经济面前，在强大的市场力量面前，传统农耕社会的衰败破落是必然的，是不可能“复兴”的，更不可能靠义和团式的（维权）“起义”来复兴。



慈善事业救不了我国农村。改善基层政权,依靠基层政权,支持基层政权,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进行改善生活的劳动,才可能“对接”政府的社会主义援助和乡村社区的社会主义自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自由派的认识相反,今天的我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社会主义才是我国农村光明的出路。

因此,国家援助农村的有限资金,不论投入到哪个具体领域,都应当成比例地起到吸引农民进行社区集体自助的作用,起到帮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作用,用于吸引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劳动去改善生活的道路。组织起来了的农民社区,以及社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不组织起来,我国农民就是分散的“虫”;组织起来了,我国的农民社区就是无数条“龙”,如志愿军一般,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与安全;如华西村一般,人均产值超越瑞士,使我们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方面,江西省赣州地区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那里,只要基层政权组织起改善生活的社区劳动,比如修路、改水、改厕、清除垃圾,美化社区环境,政府就给一定比例的拨款或材料援助。

2. 村民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建设新农村,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社区劳动是根本的出路。组织分散的个体农民极为困难。但无数农村社区集体的成功实践证明,从精神生活入手组织农民,建立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乡村文体活动的短缺绝非仅仅是钱的问题,在贫困时期,我国基层政权曾用各种“土办法”点燃了农民的激情。农村缺少文化活动的主因是回归家庭耕作以及基层政权懒惰涣散。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东风,我提出改善农村文化生活的六条建议。

第一,新农村要求恢复乡村的文化体育生活。政府应依托基层的小学、中学、党支部、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由各级政府补贴,恢复乡村的文化和体育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乡村电影放映队、乡镇图书馆、行政村书报室、每年春秋两季的乡村(学校)运